

环形开放论

——工业化时序—市场规律
与中国空间经济战略的调整

A Theory of Concentric Liberalization 董藩◎著

所谓“环形开放，回填空心”

是指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沿海、沿内陆边境同时开放，
建立起几乎能连绵相接的
对外开放带，加强
与境外毗邻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环形开放论

——工业化时序—市场规律
与中国空间经济战略的调整

A Theory of Concentric Liberalization 董藩◎著

所谓“环形开放，回填空心”

是指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沿海、沿内陆边境同时开放，
建立起几乎能连绵相接的
对外开放带，加强
与境外毗邻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形开放论 / 董藩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5017 - 7635 - 0

I. 环... II. 董... III. 地区经济—地区开发—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6700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崔姜薇 (010 - 68355210 cjw_bnu@126.com)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任燕飞工作室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8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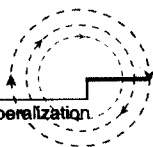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17 - 7635 - 0/F · 634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前 言

这部著作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完成的。按照惯例，答辩通过后，博士论文作为研究成果一般是要出版的。因为我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的构建》以及随后出版的《构建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一书中借用了“工业化时序—市场规律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部分内容，为避免“成果重复出版”或者“自我抄袭”的嫌疑，我放弃了出版博士论文的想法。但是，我的一些同学看到这篇博士论文后，认为除该部分外的其他内容也还有些价值，我自己也感到一些提法仍有些新意，特别是“环形开放，回填空心”这一空间经济战略模式，还是有继续研究的价值。近年来中国的空间经济战略不断发生变化，多一些思路供中央政府作为决策参考还是有意义的。

我从大学时代就关注中国的区域和空间经济问题，不知不觉中与这一学术领域结缘已经快20年了。20年对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常规的人生来说，已经是四分之一的光阴。而对我来说，这20年又是最富创造力和激情的年华。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国际会议以及《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了一些论文，承担了几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也提出了一些自认为有些新意的观点。其中有些关于政策和对策方面的建议，我曾经通过内参上报中央领导，受到温家宝、李岚清以及多位省部级领导的重视。例如，在西部大开发面积的确定、西部是否应设立特区等方面，中央政府直接采纳了我和我的合作者的意见。但是，这两年，由于教学内容的变化以及个人精力原因，我与空间经济研究渐行渐远了，尽管我一直盼望着这个研究领域兵强马壮，成果“汹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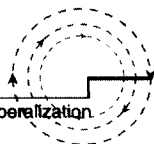
回想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求学过程，我衷心感谢我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胡乃武教授的培养，感谢著名经济学家钟契夫、卫兴华、赵人伟、刘方棫、陈德华、杨瑞龙、饶会林、黄泰岩、张可云、郑超愚等人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帮助与指教。我的朋友和同学林昆谨博士（美国）、王向明博士、王检贵博士、冯梅博士、乔根平博士、龙向东博士、戴春平博士也给予我不少



启发、帮助和鼓励。我要感谢关心我、帮助过我或者曾经给予我肯定与鼓励的各级领导。他们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原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彭清源，民革中央副主席童傅、朱培康，原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大连市委书记孙春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世萍，以及民革中央、民革辽宁省委、大连市政协、中共大连市委统战部、民革大连市委、共青团辽宁省委、共青团大连市委的领导。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学生——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岳父岳母和哥哥、姐姐们的支持；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周宇，结婚十多年来，她与我在同一屋檐共担人生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独自承担起教养幼儿的重任，使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感谢我的学生张木馨、杨玉敬、陈英娜，她们帮我处理过不少数据。最后，我要用此书向我女儿董恩昭表达我的歉意——在她最需要照顾的幼年，作为爸爸的我曾有一段时间不在她的身边。

董 藩

2006年6月18日于北京



内容简介

经济学自经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随后的凯恩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以来，就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渗透着很强的“时间”思维，但是“空间”思维却基本上都没有体现出来。因此，从学科建设角度，有必要在此方面加强研究。

如果把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尚不够成熟）和宏观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此相对应，从地表面积大小角度考察的各个对应层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便包括处于微观层面的区位经济学（Location Economics），处于中观层面的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和农村经济学（Rural Economics）以及处于宏观层面上的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我认为区位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微观主体的区位优势问题；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包括内部次区域的经济关系问题；空间经济学主要研究区际经济关系协调，以及基于国家整体空间面积基础上的公平发展与经济效益问题。

空间经济战略是空间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不论国内、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都是比较薄弱的。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研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但偏重于对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定位、产业结构设计、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描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发展道路与政策选择等内容进行研究，对空间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得是不够的。从战略角度研究国家内部各大区域的划分与关联发展问题，是今后国民经济学应当加强研究的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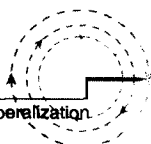
所谓空间经济战略，就是一国中央政府基于在经济增长速度、公民发展权利、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考虑，以国家作为一个完整空间单元，从总体上决定该空间内部各个区域经济布局、发展次序、分工与合作关系、经济增长速度把握等重大问题的全局性、长远性的指导原则与谋划。也可以说，空间经济战略就是一个中央政府基于对“公平”与“效率”两大常规发展目标以及特殊背景下国家安全等问题的权重掌握，从长远角度对国家内

部进行区域划分并确定发展方案的总体性规划。

由于空间经济秩序具有非竞争性消费 (Non-rivalrous Consumption) 特点,但不具有非排他性 (Non-excludability), 因此,空间经济秩序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Quasi-public Goods), 本身要求政府参与提供, 否则必然出现各种区域病甚至区际摩擦、冲突。许多国家的空间经济发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空间经济战略是国家关于各大区域整体发展指导原则与运筹方案的综合体现, 也是国家和区域制订中短期经济发展计划和区域差别政策的基本依据之一, 而且它对投资布局和重大项目的区位决策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 因此, 制订空间经济战略便成为中央政府规范空间经济秩序的基本方式。

改革开放前, 虽然中国一些从事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对西方的空间经济理论有一定了解, 但是, 由于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原因, 这些理论在中国没有传播开来并对学术活动产生明显推动作用, 更没有影响到中国空间经济的发展实践。改革开放后, 由于高等教育的恢复、发展, 学术活动的日趋活跃, 以及客观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 西方各种空间经济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部分观点被中国学术界结合着国情进行了创新, 并推动了中国空间经济的演化。例如, 冈纳·米尔达尔 (Gunnar Myrdal)、艾伯特·O. 赫希曼 (Albert O. Hirschman)、N. 卡尔多 (N. Kaldor) 提出的各种“差距扩大论”, 为中国学者反思传统的空间发展理论, 强调政府在空间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J. G. 威廉姆森 (J. G. Williamson) 提出的倒“U”型理论使许多中国学者坚信“梯度推进论”的科学性, 以至于影响到了国家战略决策; 弗朗索瓦·佩鲁 (Francois Perroux)、艾萨德 (W. Isard) 等人的“增长极”理论 (Growth Pole Theory) 启发着中国学者提出了多种“点轴开发”模式; 简·戈特曼 (Jean Gottmann) 1961年出版的著作《大都市带: 东北海岸的城市化》(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也使中国学者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城市化问题, 提出了“九大都市圈”等理论模式。

回顾中国空间经济战略方针与实践的演化, 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 1953年至1978年: 均衡发展阶段。当时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以及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形势的影响下, 中国在空间经济战略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遵循着均衡发展的方针。必须承认, 这种决策和探索是缘于当时的理论认识和客观局势, 有其较充分的历史合理性, 也有一些明显的积极意义, 不能因为战争并没有发生而就认为这种决策和实践是错误的, 也不能说



所有投资活动都未考虑经济规律的要求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但承认其历史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绝不意味着这种空间经济战略方针和实践完全科学、正确，没有缺陷。(2) 1979 年至 1999 年：非均衡发展阶段。向东部沿海倾斜的非均衡空间经济战略方针的实施，是对均衡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全面调整。这是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变化和西方空间经济理论、发展经验与教训的传入以及国内国际形势演化而促成的。非均衡发展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有着不同的战略表现形式。称得上国家空间经济战略的有两种，即“梯度推进”战略与“T”型开发（开放）战略。这一非均衡发展阶段是中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原则，追求宏观经济效益的阶段。中国借助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采用改革与开放双重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投资布局，塑造出一种非均衡的空间经济结构。在这一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效应表现得都非常明显。(3) 2000 年截至目前：再均衡发展阶段。经过 1979 至 1999 年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地区承担的“试验田”、“桥头堡”和“衔接部”三项使命已经基本或阶段性完成。1999 年 6 月，江泽民提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同年 9 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思路和战略重点。自此后，中国进入到“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国家空间经济均衡发展”的空间经济战略阶段，其实施效果主要取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

“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国家空间经济均衡发展”的空间经济战略，其目的除了要缩小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经济运行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外，还在于要借此发掘内需，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达到 8% 以上的速度，为“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这种决策是既要公平，又要效率，“鱼”与“熊掌”一个不丢。这对公平的改善肯定是有有效的，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对全国的经济增长来说未必会做出多少实绩。鉴于此，必须认真分析新形势下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调整整个空间经济发展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思路，才有可能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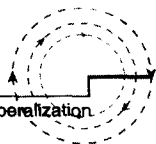
不论是从追赶战略的实施、从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来看，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来说意义都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从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角度来看，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还具有特殊意义。1979 ~ 2001 年，中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9.5%，处于高速增长

阶段，居同期全世界首位。但是，从1992年开始却出现了持续下滑趋势，由1992年的14.2%一直跌至1999年的7.1%。2000年略有回升，达到8.0%，但2001年又重新掉头下滑至7.3%。对此，学术界给出了多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又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至少解释得不够充分。如果说仍是经济周期的规律反映，则这个经济周期表现出的特点与以往大不相同，难以解释，而且又找不到能证明未来几年经济形势会明显好转的令人信服的依据。从人均GDP水平看，按照罗斯托（W. W. Rostow）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权威说法，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高增长时代不该如此短暂。于是，一个世纪之交的“经济增长速度之迷”诞生了。

如果已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就必须超越已有理论的分析框架，寻找新的逻辑思路，建立新的理论范畴，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我认为，各国在工业化发端时间上存在一个时序排列，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工业化发端时间的不同必然导致工业化进程的市场背景 and 产品销售空间的迥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走势。

所谓工业化进程，是指一国从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开始到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国从开始大规模放弃手工劳动而采用机器劳动加以替代到机器劳动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普及性基础的生产技术演进轨迹及其对应的时间跨度。以英、美、德、意、法等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丹麦、芬兰、挪威、中东石油国家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它们工业化进程的发端时间是很早或比较早的。它们开始时面对的就是世界性市场（当然开始时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随着供给能力的增加，国际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了国际市场销售比例大于国内市场的状况），且拥有技术优势，从总体上看在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升级过程中总是处于前列，尽管发达国家之间在产品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上也出现过此消彼长的排名变化。工业化起步较早的这些发达国家同时还拥有贸易优势，在产品声誉、市场调研水平、贸易手段与策略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样，从总体上看，抛开战争、战后重建和大危机等特殊时期，只要不出现全球性的供大于求局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趋势是比较平稳的。事实上，全球性的供大于求局面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需求不是一个静态的总量，它会不断升级，不断进行结构和区域转移，供给也将随之不断进行调整。英、美、法、德、日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实践充分印证了我的结论。

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在国际分工中拾遗补缺。第二，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



中承接被发达国家转移和淘汰的行业。第三，在政府的保护下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均有表现。其中第三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是关上国门搞工业化建设的。1978年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虽然在逐渐提高，但许多法律、政策与制度（例如关税制度）在保护民族工业方面仍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直到入世谈判，中国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方面也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安排。这样，整个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能交融或交融程度较低，被明确地区分开来。虽然中国在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渴望自己的产品能多多出口，但由于花色品种和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不能抵补发达国家的效率优势，再加上营销技术和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其产品出口比例较小，主要是内销。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短缺现象消除后，必然出现供给相对过剩局面，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因此，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是工业化时序—市场规律的反映，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强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不能长久实施的，否则未来5到10年的财政负担将十分沉重，而且在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在银根较松的情况下信贷风险的控制也面临着较大的压力。显然，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克服或解决上述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也就无法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条件。另外，加入WTO也将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冲击而不是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竞争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又迎来了特有的难题——老龄化与失业并存，这将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劳伦斯·R. 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教授在2002年分析日本最近10年的经济萧条时论述过类似问题。

我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的发展思路，2000~2020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可能会在5%~5.5%之间，或不该远离这个区间，这是工业化时序—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既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意义重大，而规律又是如此冷酷，是否就无力回天了呢？不是！如果顺应工业化时序—市场规律，改变目前它在中国发生作用的条件，大力开拓产品的境外销售空间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区域，内需、外需结合拓展，则有可能将经济增长速度提升2.5%~3%，使2000至2020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左右。考虑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和基础、中国加入WTO的契机、地缘优势、产业结构等各种因素，我建议中国结合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调整空间经济战略的思路，采取“环形开放，回填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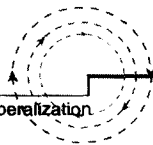
的战略模式，在未来 2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通过重点构建缘内陆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实现内需、外需结合拓展，以便实现较高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目标。

所谓“环形开放，回填空心”，是指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沿海、沿内陆边境同时开放，建立起几乎能连绵相接的对外开放带，加强与境外毗邻国家和地区的合作。这样，沿边境就会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环形”开放带。距离边境较远的一些区域，便成为对外开放的“空心”或者“盲区”。处于“空心”地带的为目前中部地区的主体部分以及西部一部分地区。由于这个“空心”处于环形对外开放带的包围之中，四周的开放“峰岭”最终会对其产生一种“回填”作用，带动它一起发展。位于“空心”区域的中部地区基本处于中国的核心或中间位置，大多数面积已经得到相对较好的开发，发展的压力不是很大，所以，不将其列入对外开放地带也没有太大关系。对于处于“空心”区域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少数偏远落后地区，中央政府仍要加大开发力度。

“环形开放，回填空心”战略的方针，是希望借助内需、外需两种力量，把“公平”与“效率”两个发展目标结合在一起考虑。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要走出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问题，就要忽视空间均衡发展问题；注重空间均衡发展问题，就要冷落经济增长问题”的窘境：中央政府可以动用较多的财力及其它资源开发以西部为代表的落后地区，极大地改善中国空间经济发展的公平状况，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甚至更大国际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其它资源加以弥补，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外需的增大加以消化。由于周边及其相连国家和地区人口众多，在国际贸易的带动下，国内的需求不足便通过外需的扩大得到了弥补，工业化时序—市场规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便得以破解。这样，在未来 2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将有可能继续保持平均 8% 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对中等发达国家的追赶。

我认为，在信息时代，在高科技条件下，战争已经没有了前后方之分，所以环形开放、构建缘内陆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不涉及经济布局的国防安全问题。空心地区虽不处于对外开放地带，但由于位置的特殊性以及中央政府对其中部分地区的继续支持，也绝不会沦陷下去，成为病态区域。

由于沿海国际经济合作带已经形成并具有较好的基础，可以自我发展，因此，在这一空间经济战略模式下，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构建缘内陆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上。由于沿内陆边境内外广大地区在产业结构上存在许多互补性，在供需对接方面存在冲动。与境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有许多技术



尤其是轻工业技术存在优势，再加上中国与它们在文化、意识形态、民族渊源、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交通条件等方面有许多相通、相近的地方，因此，构建缘内陆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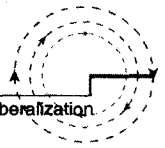
在推动缘内陆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基础设施及其它硬件环境建设外，必须做好如下几项重点工作，以确保“环形开放，回填充心”战略的有效实施：一是调整广大沿边地区的工业结构，放重抓轻，将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二是调整对外贸易工作规划，尽快形成沿海、沿边两个地区并重的局面；三是设立自由贸易区，推进边贸工作的开展；四是大力推进跨境投资工作；五是加强与境外国家的沟通，理顺双边经济秩序；六是通过移民方式向沿边地区聚集人口和劳动力。

BRIEF INTRODUCTION

Through the major paradigms of economic studies –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classical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 economists have drawn a constant distinction between macroeconomics and microeconomics. While the time dependent analysis is de rigueur in both macroeconomic and microeconomic analysis, the “spatial” or geographical component has yet to receive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lear formulation. I believe this area calls for increased attention and new studies to contribute to a scientific paradigm.

Given the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of microeconomics, meso – economics (yet to be rigorously defined), and macroeconomics, topics that simultaneously address these levels and provide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include locational economics, regional economics, urban economics, rural economics, and spatial economics which deal mainly on the macro – level. I have interpreted these subfields with the following emphases: a) locational economics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maximizing the locational advantage of firms; b) regional economics studies aim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metropolitan areas and interior regions; c) spatial economics focuses on the linkages between domestic reg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need for structural adjustments, the challenges of balanced growth for all economic reg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welfare.

Spatial economic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area of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economics, yet has to date been relatively neglect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like. In the mainstream works produc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the spotlight is directed toward understanding aggregate growth rates, pursu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ascertaining of living standard, and establishing and elaborating a national social welfare network, etc. In any case, spatial economic strategy has received inadequate attention.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various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ir co – development potential re-



presents a primary area of new research and theories.

I speak of spatial economic strategy as encompassing the following logic: considering the r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citizens' rights to fair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the national economy should be construed as a geographic unity under which corollary relationships of regional linkages, order of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rdination, and variations in growth rates should be planned out by the central reformers in a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scope. In other words, spatial economic strategy require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ctively weigh the demands for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implement a long-term vision in setting the agenda for the developmental plans of each and all major domestic regions.

Since the well-ordering of a spatial economy display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rivalrous consumption, non-excludability, it can be seen as a form of quasi-public goods, thus requir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provision in order to overcome probable market failures or resource contentions. The deliberate spatial economic strategies of many countries amply demonstrate this need. Since spatial economic strategy reflects the government's overarching guideline and fundraising objectives for major economic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signals the dir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projects, its formulation capture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key domestic regions.

Prior to economic 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 Chinese scholars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economics were not unaware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of spatial economics, but showed little success in disseminating and promoting intellectual debates over these theories du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their times. Since 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 the revival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related increased dynamism of the academic sphere have prompted a more objective and pract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se Western theories. For examples, Gunnar Myrdal, Albert O. Hirschman, N. Kaldor had put forth the influential theory to "widening gap" of development, which lend credibility to the anti-mainstream views of a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who emphasize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spat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 G. Williamson's "inverted U-curve" theory encourage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scientific merit of a "stepladder progression" in developmental strategy. Francois Perroux, W. Isard, and th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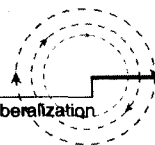
who built on their notion of the “growth pole theory” prompted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o advocate a “hub – initiated development.” Jean Gottman’s 1961 magna opus, *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also directed Chinese scholars to rethink th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from an even more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leading to the proposal for “Nine Metropolitan Circles” and other plans.

Revisi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eneral direction and oper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spatial economic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we could discern the following phases:

1953 – 1978: Equalitarian Development. Under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Marxist – Leninist thoughts and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ends, policy at that time closely observed an egalitarian principle. At the same time, one must also acknowledge that this policy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convergence with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 and projected a preemptive or proactive stance. In short, we could not criticize it simply because no war occurred to test its utility, and not all investment patterns showed no respect for the real need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Yet I hesitate to add that the above acknowledgments do not mean to detract from the policy’s flaws.

1979 – 1999: Disequilibrating Development. The initial breakthrough from the earlier model cam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economic takeoff. This structural shift originated from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nd its leader Deng Xiaoping’s,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al path to incorporate Western theories of spatial economics and historic lessons of development elsewhere. Disequilibrating development has taken on many concrete form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initial theoretical platform included the “stepladder progression” and the “T – model” of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is period aimed to leverag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ertain regions to spearhead aggregate welfare improvement. Borrowing from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plan and the market, and enforcing deepening restructuring and liberaliz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ramatically remapped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flows and created structural dynamics of disequilibrium. This period was marked by increasingly polarized manifesta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2000 – present: Rebalancing Development. After twenty years of reform and o-



pen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bot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ave experienced tremendous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have basically or progressively accomplished their roles as experimental and demonstration examples. In June 1999, President Jiang Zemin proposed to intensif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areas. In the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the 4th Plenum of the 15th CC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plan. Top party and governmental bodies held work conferences in November to formulate the basic objectives and strategic guidelines. Since then, China has taken a step forward toward "Deploying the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al Strategy to Spearhead a Balanced Spatial Development for the Nation," which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actual success of the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The above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al strategy is expected to confer the following benefits: reducing the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mproving market order and social sta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solidarity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raise domestic demand, sustain GDP growth at around 8%, and without entailing a significant efficiency – fairness tradeoff. I expect this strategy to produce a tangible benefit for equality, and depending on various exogenous factors, also contribute to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to some degree. Hence, I suggest a closer analysis of the key determinants affecting the growth factors under the new policy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cording make adjustments in the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ensure a simultaneous realization of fairness and growth.

Whether we are concern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ong – term strategy, with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improv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or with societal progress and stability, sustained rapid growth rate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quation. From 1979 ~ 2001, China's GDP growth averaged 9.5%, which ranked first globally. Yet since 1992, China has experience a gradual downward slide of the GDP growth rate. From 1992 – 7, it dropped from 14.2% to 7.1%. 2000 saw a slight rebound to 8.0%, but the trend resumed in 2001 with 7.3%. The academia has debated th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is national growth trend; most views contain a kernel of truth, but fall short of persuasion. Few could come up with convincing evidence to support predictions of a rosier future. As measured by per capita GDP, and according to W.

W. Rostow's reasoning for "stages of growth," China is still in midst of the takeoff period, and show not see an immediate end to rapid economic growth. Once again, we confront the "puzzle of economic growth rate" at the start of this millennium.

If the existing theory proves inadequate to explain current outcomes, new theories must transcend the older framework and seek new intellectual paths that would lead to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I argue that the unique conditions in each country's development, in particula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dvanced industrial and late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in terms of the market conditions and scope of product distribution show tremendous differentials, resulting in variations in long-term growth trends.

The stages of industrialization refer to the distinct phases in a national economy's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y start with a country's decisive move away from handicraft toward labor-saving mechanization and adoption of generally applic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in convergence with similar practices and trends in leading economies. For the early industrial powers of the Great Britain, the U. S., Germany, Italy, France, and the secondary group including Japan,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Middle Eastern oil-rich countries, the global economy was a constant presence. Possessing structural superiority in innov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early industrializers continue to enjoy an early-mover advantage in the perpetual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race even as the late-developers attempt to erase the gap. Additionally, early industrializers enjoy trade superiorities, brandnames of reputational advantages, superior market research skills, and bargaining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all these advantages that late-developers could not easily match. Thus generally speaking, setting aside the exogenous shocks of world-wide wars or economic crises, and assuming no serious oversupply in major market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fairly constant. A scenario of global overcapacities is unlikely, since demand is not a static curve but rather amenable to manipulation. As long as the aggregate demand could be shifted outward, productive factors could be restructured and factor mobility across regions ensured, the supply curve would also adjust accordingly. The historic experienc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economies supports my arguments above.

The pa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developing regions differs significantly